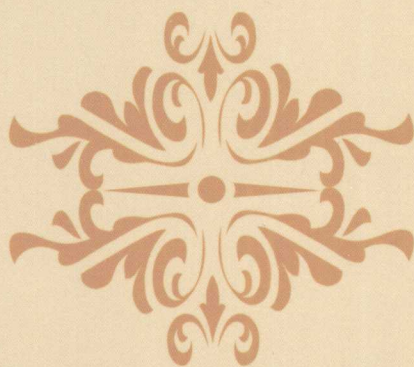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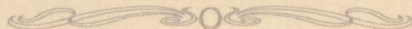
T E S E X U E K E X I L I E

上海合作组织 非传统安全研究

余建华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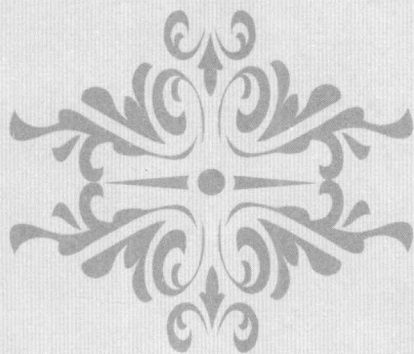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T E S E X U E K E X I L I E

上海合作组织 非传统安全研究

余建华等·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研究/余建华等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8
ISBN 978-7-80745-251-5

I. 上… II. 余… III. 上海合作组织—国际问题—安全—
研究 IV. D8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2626 号

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研究

著 者: 余建华等

责任编辑: 张广勇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4.5

插 页: 2

字 数: 44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45-251-5/D·063

定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王崇善

上海社会科学院创建于1958年。半个世纪以来,全院科研人员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为使学术研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赢得了良好的学术声誉。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审时度势,明确定位,提出把上海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新智库”的目标,以此为导向,切实推进重点学科和特色学科建设,使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科研工作和科研水平获得了进一步的提升。

社科院50年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专业研究机构,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伊始就以扎实的学术研究的各项工作的重心。我院的科研人员广泛开展社会调查,积极投入对社会主义现实问题的理论探讨。1959年4月,经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倡议,在上海召开了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为主题的全国第一次经济理论讨论会。为此,经济所成立了三个调查组,兵分三路同时开展社会调查,写出了11万字的6个调查报告。这些研究成果密切联系社会实际,记载了有关价值规律作用的许多生动资料,引起学术界的重视。1961年,姚耐、雍文远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出版,它是我国在“文化大革命”前公开出版的第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发行量达20多万册。

在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我院的科研人员也做了大量工作。1958年9月,由经济研究所科研人员编撰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10月,《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光明日报》、《学术月刊》、《新闻日报》及国外学术刊物对此作出了积极的评价。1958年以后,历史研究所的科研成果《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行为罪行》、《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戊戌变法史论

从》等相继问世。这些珍贵文献的整理和出版,为60年代初期全国史学界共同促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

197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恢复重建。广大科研人员焕发出极大的科研热情,他们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牢牢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紧紧围绕改革开放的主题,全力服务于全国和上海的发展,在基础理论和现实应用两大领域着力突破,哲学、法学、经济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都取得了一批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成果。

学科是孕育学术杰出人才的摇篮。这里仅以经济学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两个学科的发展为例加以说明:

在经济学研究领域,1980年,陈敏之提出住宅是商品的观点,为后来房地产市场的兴起和福利分房制度的改革作了最初的理论准备。1985年,雍文远主持的国家课题“社会必要产品论”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体系创新和理论深化。这两项成果都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此外,部门经济研究对社会经济的推动作用日益显著。1982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建立和开发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建议》。1983年,部门经济研究所承担的国家课题“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得出重要的研究结论:(1)上海城市经济必须从以工业为主的单功能向多功能方向转变;(2)上海工业发展必须由拼设备向依靠高技术进步的方向转变;(3)在产业结构方面,必须从优先发展工业向优先发展第三产业转变。90年代初,姚锡棠等参与开发浦东研究的学者提出:浦东应建设成为既有金融贸易中心,又有先进制造业的多功能的综合经济中心;在尽量发挥外滩作用的同时,要下决心把中央商务区特别是金融中心放在浦东的陆家嘴;浦东开发开放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带动长江流域特别是长三角的发展。而18年来浦东和长三角的发展,正是印证了姚锡棠等人的战略判断。在这个基础之上,浦东新区也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结成了战略合作关系,正在共同推进关于浦东改革“先行先试”的战略研究。

1991年11月,我院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正式成立。1993年2月,院党委决定成立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这是全国第一个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中心成立后马上参与筹备中宣部1993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1994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在中央党校、国家教委、中国社会科学院、解放军国防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组建的5个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地,要发挥骨干作用”,我院被列为全国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这一理论确立和命名为“邓小平理论”)五大基地之一。

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共同发挥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在社会主义新智库建设中的作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这是对我院建设社会主义新智库的根本要求,也是我院学科建设应当为之不懈努力的目标。

为了更好地发挥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整体优势,努力拓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广阔领域,既重视和加强原有基础理论研究,又鼓励和扶植新的学科增长点,我院于2002年正式确定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经济刑法、上海城市史研究、思想文化、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等8个重点学科,集中一定的资源推动这些学科的建设。2006年,我院的重点学科增加到12个,除原有的8个以外,还增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城市文化、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和传统中国的社会文化研究。同时,批准了14个特色学科,分别是: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文化创意产业,家庭学,租界、租借地等特殊地区研究,犹太学研究,上海合作组织研究,西方文学文化批评思潮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研究,经济伦理学,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国学术思潮史,科学哲学研究,信息资源管理,城市化研究。重点学科和特色学科的设置,体现了我院在学科定位、科研理念、科研体制和科研方法上的创新和探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哲学社会科学正在发生的转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要求。

近几年来,我院学科建设和发展取得了十分骄人的成绩。一方面为推动基础理论研究和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许多重要观点、思想和方法在上海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为上海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决策咨询和服务,许多好的政策建议都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和新智库建设正在形成新的良性互动关系。

其实,社会主义新智库建设既离不开扎实的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也离不开应用对策的系统研究。我院学科建设和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新智库的重要基础。没有学科建设和创新,就不会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和创新,新智库建设也就不会有活水之源。事实已经证明,大量的有针对性的对策研究和应用研究一定是建立在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基础上的,否则就不会有科学性,不会有说服力。因此,在推进新智库建设中,我们必须要以学科建设为重要抓手,通过促进学科发展,为智库建设提供理论基础、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为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人才服

务,为社会文明进步提供智力支持和知识服务。当前,我院学科建设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发展形势,我们应当抓住机遇,积极主动地适应党和政府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努力从如下几方面着手,加大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力度。

一是以促进学科建设夯实研究基础,推动理论创新。理论基础和科研学术能力是我们的立院之本,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智库的根本所在。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鼓励研究人员以学科发展为载体,扎扎实实做好基础理论的研究,推动基础理论创新。

二是以促进学科建设提升决策咨询研究和智库服务的能力与水平。学科建设是提升决策咨询研究能力和水平的基础。我们鼓励科研人员在开展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申请和承担决策咨询研究课题,以学科发展带动决策咨询研究。

三是以促进学科建设培养和开发智库型人才。科研人才是我们的建院之本,智库型人才则是我们建设智库能力之本。我们通过学科建设带动学术团队成长,一方面注重发挥研究者的个体主动性、创造性,同时更注重推动不同学科的综合研究和团队研究。我们要充分利用社科院多学科的优势,积极开展跨学科综合性研究,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交叉融合,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集中反映了我院重点学科、特色学科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功力扎实的理论分析,也有思想敏锐的真知灼见;有基础雄厚的体系构建,也有匠心独具的新颖见解;有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也有对现实问题的追踪。通过这些重点学科和特色学科成果的展示,我们可以感受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人员不断求索的敬业精神,同时也印证了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特别是上海的发展和繁荣。我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我院的学科建设一定会为新智库的发展做出更好更多的贡献。

2008年6月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序 论 / 1

- 一、非传统安全的区域化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 / 1
- 二、上海合作组织应对非传统安全区域化的理念创新 / 6
- 三、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合作实践的路径与特征 / 11
- 四、未来上海合作组织推进非传统安全合作的要点 / 16
- 五、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合作与和谐地区建设 / 21

—— 第一编 非传统安全理论与上海合作组织 / 25 ——

第一章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理论认识 / 27

第一节 非传统安全的由来与背景 / 27

- 一、非传统安全的由来 / 27
- 二、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的背景 / 32

第二节 非传统安全的概念与特征 / 35

- 一、非传统安全概念的界定 / 35
- 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特征 / 40

第三节 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之间的关系 / 46

- 一、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之间的联系 / 46
- 二、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之间的区别 / 49

第二章 新安全观与上海合作组织 / 55

第一节 传统安全观的演进 / 55

- 一、理想主义安全观 / 55

- 二、现实主义安全观 / 58
- 三、新自由主义安全观 / 62
- 四、建构主义安全观 / 64
- 第二节 新型安全观的涌现 / 69
 - 一、综合安全观 / 69
 - 二、共同安全观 / 71
 - 三、合作安全观 / 73
 - 四、人类安全观 / 75
- 第三节 新安全观：上海合作组织的指导理念 / 76
 - 一、非传统安全维护与安全共同体 / 77
 - 二、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与上海合作组织进程相伴 / 80
 - 三、中国新安全观的理论内涵和重要意义 / 86

第二编 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 93

第三章 中亚及周边“三股势力”问题与毒品问题 / 95

- 第一节 中亚“三股势力”问题 / 95
 - 一、中亚“三股势力”的兴起和发展 / 96
 - 二、中亚“三股势力”活动的根源、特征和危害 / 103
 - 三、伊拉克战争后中亚“三股势力”的新发展 / 110
- 第二节 车臣“三股势力”的兴衰：历史和现实 / 120
 - 一、车臣民族问题的由来 / 120
 - 二、车臣“三股势力”的兴起 / 129
 - 三、车臣“三股势力”由猖獗走向衰败 / 135
 - 四、解决车臣问题的经验与启迪 / 139
- 第三节 “东突”问题与“东突”恐怖势力 / 142
 - 一、历史上的突厥人和泛突厥主义 / 142
 - 二、昙花一现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 145
 - 三、“东突”势力的恐怖分裂活动 / 147
 - 四、“东突”势力与国际恐怖力量的勾结 / 153
 - 五、“9·11”后“东突”势力的活动趋势 / 155
- 第四节 阿富汗和中亚的毒品问题 / 162

- 一、阿富汗的毒品问题状况 / 163
- 二、中亚国家的毒品问题状况 / 166
- 三、阿富汗和中亚毒品问题根治艰难 / 171
- 第四章 中亚资源与环境问题 / 177
 - 第一节 里海油气资源的主权争端 / 177
 - 一、里海油气资源概况 / 178
 - 二、里海油气国际竞争战背景 / 180
 - 三、里海的法律地位及其油气主权的争议 / 182
 - 第二节 里海油气输出管线建设的竞争 / 188
 - 一、西线方案 / 188
 - 二、北线方案 / 189
 - 三、南线方案 / 191
 - 四、东线方案 / 193
 - 第三节 国际各方在里海油气开发领域的角力 / 195
 - 一、美国 / 195
 - 二、俄罗斯 / 197
 - 三、日本 / 199
 - 四、欧盟 / 200
 - 五、其他国家 / 201
 - 六、影响与特征 / 203
 - 第四节 中亚水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 / 204
 - 一、中亚水资源问题 / 205
 - 二、中亚生态环境问题 / 209
- 第五章 中亚社会稳定问题 / 213
 - 第一节 “颜色革命”与中亚 / 213
 - 一、“颜色革命”的由来 / 213
 - 二、吉尔吉斯斯坦的“3·24事件” / 218
 - 三、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事件 / 222
 - 四、“颜色革命”在哈萨克斯坦遭到“阻击” / 225
 - 第二节 中亚人口、移民与贫困化问题 / 228
 - 一、中亚地区的人口状况 / 228
 - 二、经济转型导致贫困问题突出 / 231

- 三、贫困化加剧移民问题 / 235
- 第三节 中亚国家转型中的“社会病”与民主化浪潮 / 240
 - 一、解构联盟：苏联解体前后中亚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 / 240
 - 二、转型中的“社会病”：中亚民族国家的困境 / 244
 - 三、苏联解体以来的全球“民主化”浪潮 / 247
 - 四、全球“民主化”浪潮对中亚社会稳定的影响 / 250
 - 五、对西方主导下的全球“民主化”的反思 / 254
- 第四节 中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与“颜色革命” / 258
 - 一、西方非政府组织在中亚的发展 / 259
 - 二、西方非政府组织在中亚活动的基本模式 / 263
 - 三、西方非政府组织与“颜色革命” / 265

—— 第三编 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实践 / 271 ——

第六章 “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 / 273

第一节 “上海五国”框架下的传统安全合作 / 273

- 一、五国两方会谈与两个协定的签订 / 274
- 二、军事互信机制的建立 / 276
- 三、边界问题的逐步解决 / 278

第二节 “上海五国”框架下的非传统安全合作 / 279

- 一、应对中亚安全面临的新挑战 / 280
- 二、“上海五国”非传统安全合作的起步 / 282
- 三、“上海五国”升格为上海合作组织 / 284

第七章 上海合作组织的非传统安全合作 / 289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初创期的非传统安全合作 / 289

- 一、安全合作被确定为首要任务 / 289
- 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 / 291
- 三、“9·11”事件后的应对 / 293
- 四、《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和地区反恐机构 / 297

第二节 上海合作组织稳定发展期的非传统安全合作 / 302

- 一、强化打击“三股势力” / 302
- 二、举办联合反恐军事演习 / 307

三、遏制跨国毒品犯罪 / 312	
四、开展能源国际合作 / 315	
五、推进生态环境合作治理 / 320	
六、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其他合作 / 325	
第八章 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的国际合作 / 331	
第一节 美国与中亚安全、上海合作组织 / 331	
一、“9·11”事件前美国对中亚的政策 / 332	
二、“9·11”事件后美国对中亚及上海合作组织的政策 / 334	
三、“大中亚计划”及其对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的影响 / 337	
第二节 欧安组织、欧盟与中亚安全、上海合作组织 / 343	
一、欧安组织与中亚安全 / 343	
二、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 / 347	
第三节 独联体集安条约组织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 / 353	
一、独联体及其框架下的集安条约组织与中亚安全 / 353	
二、上海合作组织与集安条约组织的合作关系 / 357	
第四节 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安全合作的发展前景 / 360	
一、中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多元复合性 / 361	
二、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安全合作前景广阔 / 365	
参考文献 / 369	
后 记 / 377	

序 论

当告别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旷世惨剧和冷战威胁惊心动魄的 20 世纪,进入全球化迅速发展、国际局势深刻演变的后冷战时代,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在新世纪、新千年,人类如何汲取历史教训、免遭战争涂炭,在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环境下,各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如何和谐共处,友好合作,共谋繁荣发展。作为新世纪在欧亚大陆腹地新诞生的一个国际区域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把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作为首要任务,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推动地区和平发展及合作方面发挥着举世瞩目的积极作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7 年来,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新安全观和“上海精神”理念为指导,不仅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和平、开放、合作的光辉形象,也已成为中国构建和谐周边、和谐亚洲乃至和谐世界外交实践的最为重要的国际平台之一。

一、非传统安全的区域化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

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的概念。安全一般是指事物的生存免于威胁或危险的状态。在国际关系中,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就是指处于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下的民族国家的安全,其基本目标包括保证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社会制度以及国民生命财产不受威胁或损害,防范外部敌对势力的攻击。在传统安全理论看来,“安全不仅是国家最终生存的欲望,而且是国家生存在重要利益和价值观不受威胁的环境中的欲望”。^① 因此,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心所在,安全关注的对象主体主要是国家,其强调主要以军事实力和战争手段来应对威胁。这种传统安全观一直持续到冷战时期。

但在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崩溃、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加深以及人类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一

^① Vernon Van Dyk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1957, p. 35.

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为对各国和平、稳定与发展的严重威胁。首先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到中期,前苏联东欧地区掀起国家分裂和民族冲突的汹涌浪潮,非洲大陆惨绝人寰的部族屠杀此起彼伏;其次是 90 年代中后期墨西哥、东南亚和俄罗斯先后爆发严重的金融风暴,引起连锁性的地区经济危机;再次是世纪之交“9·11 事件”等震惊全球的恐怖主义袭击,以及不久前蔓延多国的“非典”、“禽流感”等疫病肆虐;此外近十多年来,环境污染、资源短缺、跨国犯罪等诸多全球性问题对人类生活的危害也逐渐上升。

面对日趋多元化的国际安全威胁,传统安全研究却难以解释其形成的根源和发展的动力,因此“世界政治的发展要求在两个方向上扩大安全研究的领域,即非军事安全和非国家行为体”^①。在这一背景下,“批判性安全研究”^②(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应运而生,将安全的重心从国家的关注转向对人的关怀,安全不仅仅局限于特定的主权国家,还包括所有的人的社会关系和所有的社会。“批判性安全研究”的主要流派——“哥本哈根学派”的领军人物巴瑞·布赞更是将安全研究的领域大为扩展,明确提出:“采用一种更加多样的研究议程,在其中经济、社会和环境安全事务扮演着与军事和政治安全相提并论的角色。”^③由此可见,非传统安全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指非国家行为体对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构成的军事或非军事的威胁,二是指“人的安全”方面的议题,即与外部相联系的原因所造成的对社会与人的威胁,如环境问题(全球变暖等)、人口增长与资源匮乏、公共健康、跨国犯罪、种族或经济不平等产生的对立问题等。换言之,非传统安全从安全主体和安全领域两方面扩大了传统的安全概念,所谓非传统安全就是指来自非国家行为体的对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以及个人、群体和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非军事威胁和侵害。

非传统安全问题大多属于跨国性的公共问题,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这类问题不以领土边界为限制,相关国家不能从物理和技术上排除其对本国或者他国产生影响;第二,这类问题模糊了国内与国际的界限,既非单纯的国内问题也非单纯的

① Peter J. Katzenstein, “Conclusion: National Security in a Changing World”,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s.),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524.

② “批判性安全研究”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 1994 年 5 月加拿大多伦多举办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泛指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生态政治论和建构主义等所有后实证主义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在安全研究上形成的不同于现实主义战略研究等所谓“传统安全研究”(traditional security studies)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参见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 Williams (eds.),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Concepts and Cas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p. vii - xx.

③ [英]巴瑞·布赞等:《新安全论》,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 页。

国际问题,而是在国内与国际之间具有很强传递性效应的问题;第三,这类问题是整个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成为多个国家间共同的安全议题^①。非传统安全的跨国性特征促使冷战后的国际安全格局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安全区域化^②(regionalization of security)态势:一方面,原来为冷战体系所“覆盖”的地区冲突开始表面化和独立化;另一方面,国内矛盾和不稳定因素在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下不断超越国家边界而“外溢”到邻近国家,形成区域性影响。

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宣布独立,从而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出现了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板块。中亚地区在历史上就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频繁的民族迁移和战乱遗留了诸多领土争议、民族争端与宗教隔阂,同时中亚连接欧亚大陆东西南北的独特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易于招致外部力量对地区事务的干预,因而在其内部和周边都存在或潜伏着形形色色的安全威胁,成为冷战后安全区域化态势表现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

首先,安全地区化表现为安全威胁的区域化,即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区域内部各种矛盾的紧张和冲突。

冷战结束后,中亚五国的国家建构是通过以市场化和私有化为导向的经济转轨和以民主政治为特征的体制转型来推进的。然而前苏联时期的体制性弊端和政策失误所日积月累而成的诸多不稳定因素严重干扰和扭曲了中亚各国的转型进程。前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以民主化和公开性为旗号的政治改革使中亚地区长期压制着的民族纠纷和民族矛盾得到了释放,意识形态上的混乱和真空状态也为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在该地区的兴起与泛滥创造了便利条件。与之同时,前苏联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系导致中亚各国的经济结构存在不同程度的片面和畸形,极大地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匆忙披挂上阵的中亚各国政府在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就草率地推进不切国情的经济转轨,导致了严重的经济滑坡和巨大的社会贫富差距,失业人口激增和普遍的经济贫困化严重削弱了政府的控制能力和执政基础,刺激了毒品犯罪、非法移民等跨国犯罪活动的兴起,提供了“三股势力”合流作乱的社会土壤。不仅如此,与阿富汗邻近的中亚各国还不得不承受前苏联扩张政策的苦果——阿富汗在前苏联入侵后长期

① 参见苏长和:《周边制度与周边主义——东亚区域治理中的中国途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期。

② 安全地区化的相关论述参见刘兴华:《非传统安全与安全共同体的建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王学玉:《国际安全的地区化:一个分析的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2期。

处于内战和分裂状态,经济完全崩溃,当地居民只能将种植毒品作为谋生的重要手段,成为欧亚大陆上主要的毒品生产和制造基地之一,极端恐怖势力猖獗坐大,沦为“三股势力”盘踞、蛰伏的据点。由此可见,中亚地区成为“三股势力”肆虐、毒品泛滥、非法移民和社会失序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迭起的动乱带,其根本原因在于中亚国家的体制性弊端和结构性矛盾在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以各种复杂的“社会病”形式集体爆发出来,并迅速上升为该地区和平与稳定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

其次,安全地区化意味着安全命运的区域化,即安全威胁危及整个地区的所有国家的安全,地区内的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袖手旁观,而是必须同时关注本国和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本国的安全与他国和本地区的安全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长期以来,中亚各国和俄罗斯、中国之间在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和宗教等各方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安全上形成了唇亡齿寒的相互依赖关系。冷战后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中亚作乱的“三股势力”不仅以暴力恐怖手段煽动宗教狂热、制造民族分裂,与中亚各国的政治反对派沆瀣一气,频繁采用暴力恐怖的扰乱手段对抗、威胁中亚世俗政权,而且还与周边地区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及其庇护下的国际恐怖主义集团“基地”组织、俄罗斯车臣匪帮、分裂中国新疆的“东突”势力、克什米尔分离主义者等相互勾结、里应外合,使俄罗斯、中国等国的边疆安全和领土完整面临严峻挑战,成为危害中亚及周边国家和平与稳定的毒瘤。因此,“三股势力”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虽根植于中亚国家自身的各种弊病,但俄罗斯、中国也是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直接受害者,在打击“三股势力”、毒品犯罪等问题上与中亚各国有着同样迫切的安全利益诉求,而且俄、中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维护和促进中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上也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可以说,俄、中两国与中亚国家不仅由于地理位置的相邻而形成了一个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地区,同时共同的安全威胁和共同的安全命运也使彼此之间确立起了密切的互动关系,其互动程度明显超过了它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互动水平,从而构成了一个安全意义上的国际性地区。^①

最后,安全区域化还体现为安全行为的区域化,即地区内各国开始超越单方面的自助安全行为而寻求以互助的安全合作来摆脱安全困境,应对共同的安全威胁,

^① 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际性地区就是“由一种地缘关系和一定程度的相互依存性联结到一起的有限数量的国家。”Joseph S. Nye, (eds.), *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 Readings*,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68, p. 5.

并形成了为各国所接受的区域安全秩序。

中国和前苏联长期存在着领土和边界争议,在1969年发生了严重边境军事冲突,形成了长达几十年的敌对和僵持状态。1991年苏联解体为破解中苏之间的安全困境创造了历史机遇。原来中国与苏联长达7000多公里共同边界,变为中国与俄、哈、吉、塔四国的共同边界,中苏双方一对一的边界谈判也相应地转变为中国为一方对以俄、哈、吉、塔四国为另一方的五国两方谈判。经历了长达7年22轮谈判后,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于1996年4月26日在上海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由此开启了“上海五国”进程。次年4月,五国元首又在莫斯科签署了《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按照前述两个协定的指导原则和精神,在随后短短几年内,中国与俄、哈、吉、塔通过谈判,先后圆满地解决相互间的边界问题。21世纪初,为了适应地区形势的发展和各成员国之间深化合作的需要,“上海五国”成功实现了由首脑会晤机制转变成区域性多边合作组织机制的历史性飞跃。

2001年6月15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新加入的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相聚上海,共同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庄严宣告上海合作组织的诞生。同时,六国元首还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简称《上海公约》),为联合打击“三股势力”、扩大安全合作的范围奠定了法律基础。《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中明确宣示:“‘上海五国’进程中形成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上海精神’,是本地区国家几年来合作中积累的宝贵财富,应继续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新世纪‘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①次年在圣彼得堡峰会上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中再次确认“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该组织的指导精神,并在同时发布的《元首宣言》中强调:“国际社会需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和相互协商为基础的新型安全观。这有利于彻底消除安全破坏因素和新威胁的根源。”^②

由此可见,“上海五国”一上海合作组织合作进程是中亚地区各国力图超越冷战思维,遵循平等、务实、合作的原则和相互尊重、理解、信任的精神,在新型安全观的指导下以政治协商而非军事手段来解决传统安全问题、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和

①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外交部欧亚司编:《上海合作组织文件选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②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圣彼得堡2002年6月7日),外交部欧亚司编:《上海合作组织文件选编》,第70页。